

探寻促进教育公平的中国方案

余秀兰

DOI:10.14121/j.cnki.1008-3855.2025.06.005

公平是现代社会的重要追求,但现代化并不必然带来公平,西方一些国家甚至陷入发展与不公平的悖论,在教育上表现为教育发展与教育不公平加剧并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西方有不同的特色,我国的教育公平问题也有自身的情境性,需要关注有关教育公平的本土问题,探寻促进教育公平的中国方案。

关注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的情境性。中国的教育公平问题植根于中国的情境,比如从社会结构与制度层面看,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以及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了城乡教育差距、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随迁子女教育、县中教育等问题;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引发教育的区域差距;资源不足、经济短缺背景下的重点学校制度,在提升办学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了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距,等等。这些问题与国外较多的阶层不平等、种族不平等并不相同,而且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新中国成立时间不长,又经历了较多的社会变动或转型,因而社会结构的固化程度也比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弱。从文化及传统层面看,中国社会有不畏困难、不惧吃苦、努力向上的文化基因,科举制度的历史也强化了教育的价值,所以即使处于不利处境的人们也非常重视教育。不同于国外学者所提出的“反学校文化”、“贫穷文化”,这种教育观念方面的“弱者非弱”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人面临不利处境的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也加剧了教育功利化价值及教育竞争,并使人们对教育资源配置、高考选拔制度等涉及教育公平方面的问题非常敏感,更难有主观的教育公平感知。

探寻促进教育公平的中国方案。首先,中国在促进教育公平过程中最具特色的是制度优势。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经济制度,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政府对不公平起着重要的干预作用,如学者王绍光所分析的,1980年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着双向运动:从伦理经济到市场社会的市场化运动、政府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后者即政府对不公平的干预,包括缩小不平等如缩小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以及降低不安全如设置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教育上如城乡教育一体化政策、西部支持计划、义务教育政策、学生资助政策、专项招生计划等。政府对教育不公平的干预是避免出现现代化与教育公平悖论的重要制度基础,也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色。但过于制度依赖也会伴随资源不足、政策滞后、行政僵化等问题,需要探索如何进一步提升效率,同时充分利用市场力量。其次,从文化层面,一方面,改变过去看待困境群体的劣势视角,从优势视角看到他们的能动性,充分激发勤奋、努力等中国传统优秀基因。同时也需注意,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激发努力读书的寒门情境越来越少,加上手机及网络的诱惑、家庭教育缺失等,如何激发困境家庭孩子的学习动力,使其始终保持对教育的希望与信心,不至于陷入结构与自我的双重淘汰,成为新的挑战。另一方面,学校教育要改变为优绩而教的应试教育理念,转向为人人而教,关注困境学生的发展。《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已经将“面向人人”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八大理念之一,但在长期的应试教育环境中,为追逐优绩而将资源过多集聚于成绩优秀学生已经成为不少学校的惯例,如何改变优绩至上的应试教育文化,并更多关注困境学生的不利背景与特殊需求,非一朝一夕之事。第三,紧随时进步,不断提升教育公平水平。要从关注入学机会的公平转向重视教育过程、教育结果的公平以及人们的主观公平感、教育获得感。当前在高质量发展与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如何扩优提质,从“集中优势”到“均衡优质”,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是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此外,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如何利用数字技术促进教育公平,并同时避免技术赋能可能带来的“数字鸿沟”,是全世界面临的难题。在这些新兴科技方面我国与国外发达国家的起步相差并不太远,我们完全有可能提出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方案。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教育公平问题正属于这种重大问题,需要教育研究者关注中国情境,提出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同时形成原创性的概念与理论,以丰富整个知识体系。

(作者系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